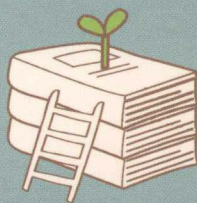


WHAT KIND OF EDUCATION DO WE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BASIC
EDUCATION REFORM

?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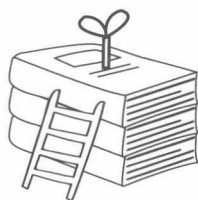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概论

张荣伟 著

WHAT KIND OF EDUCATION DO WE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BASIC
EDUCATION REFORM

?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中 国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概 论

张荣伟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孔 军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概论 / 张
荣伟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7
ISBN 978 - 7 - 5041 - 6724 - 8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基础教育—教育改革—
研究—中国 IV. ①G63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3325 号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概论

WOMEN XUYAO ZENYANG DE JIAOYU ——ZHONGGUO JICHU JIAOYU GAIGE GAILU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167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开 本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4.5

印 数 1 - 3 000册

字 数 235千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教育改革需登高望远

朱永新

张荣伟的新著《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概论》就要出版了，希望我能够写点文字。大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博士生导师，相对比较熟悉他的思想与文字吧？或者，因为这本书介绍的九大教育学派，也包括了“新教育实验”，他希望我成为第一位读者，听听我的意见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怀着为自己的学生摇旗呐喊的快乐心情，断断续续读完了书稿。认认真真读完，我发现真的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于是，欣然写下一些感想。

我曾多次去福建省厦门市，虽然很多地方移步换景，不乏精彩，但直到有一天登上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才真正看清厦门的地理位置和整体风貌。观察任何事物，最重要的是明确立场，最难得的是找到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或“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同样，要整体把握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找到观察中国基础教育的“制高点”。“制高点”是决胜的关键。或许，这个“制高点”就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只有找到了这个“制高点”，只有从本体论（什么是改革）、价值论（为什么改革）、方法论（怎么改革）等不同维度确立可靠的改革观，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获得实质性进展。否则，“顶层设计”无从谈起，必然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必然出现形式主义、盲目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偏



向。荣伟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构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哲学（观）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2003年至2006年，荣伟在苏州大学跟我读教育哲学博士。那时，“新教育实验”才刚刚启动，荣伟经常随我参加各种会议，听我的各种讲演，经常和我一起到中小学去与一线的校长、老师交流，了解实验进展状况。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的博士生，是必须作新教育研究的。荣伟也不例外。所以，他不仅在论文选题时把新教育的话语体系作为研究方向，而且协助我做了大量“新教育实验”的事务工作。亲身参与实验，为他研究实验提供了切实的感受；生命在场的体验，也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基础教育改革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荣伟这本书的基本论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初见端倪。博士毕业以后，他回到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为教育专业本科生开设了“基础教育改革研究”这门必修课。据说，已有七届学生（2004级—2010级）修了他的这门专业课，而他一直是这门课程唯一的授课教师。另外，这些年他还为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先后讲授了“教育哲学”、“当代教育理论专题”、“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研究”等课程，“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话题。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荣伟一直没有忽视阅读、思考和写作，先后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基础教育‘九大学派’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基础教育‘十年课改’的历史考察与反思”等研究项目，并出版了《当代基础教育改革》（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新课程改革”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如果说已出版的三本书，重点在于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点状和线性描述的话，那么，现在这本书的特色则在于，自觉地构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总体认知框架，试图为探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确立更为宏观、更为根本、更为可靠的问题域。

在我的博士生中，荣伟是比较擅长理论思维的，也是比较能够坐冷板凳研究学问的。在“新教育实验”的理论构建过程中，荣伟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我经常说，问题的高度和深度直接决定理论的高度和深度。细读全书，可以看到清晰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逻辑结构。我想用下面这个表格来呈现本书的内容框架。

前言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当代格局	我们在争论什么 我们在借鉴什么 我们在探索什么
言说方式	谁在言说 向谁言说 如何言说
话语类型	意识形态话语 知识精英话语 平民实践话语 大众诗性话语
行动逻辑	谁来改革 改革什么 怎么改革
实践模式	行政模式 专家模式 校本模式 共同体模式
主体形态	政策规划型主体 理论建构型主体 实践突破型主体 商业炒作型主体 社会公益型主体
对象与目标	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 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 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 改变父母的家教理念 改变人才的评价制度 改变教育的研究范式
教学关系范型	多教少学 先教后学 以教定学 教学分离 教学互损 少教多学 先学后教 以学定教 教学合一 教学相长
九大学派	情境教育 情感教育 理解教育 生命化教育 主体教育 指导—自主学习 新基础教育 新教育实验 新课程改革
结语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脉络、现状、问题的把握是系统全面的，分析是鞭辟入里的。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研究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最优秀的著作，最具深度的研究成果。

我们知道，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非常重要。“顶层设计”所强调的是“全局意识”和“整体谋划”，它需要拥有一个考察教育改革现状的整体认知框架，需要拥有推动教育改革的可靠的立场、视角和思维方法，或者更直接地说，需要一个教育改革的哲学。可以说，正因为改革哲学的不同（虽然有些改革者自己并没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事实上也会有个人混沌的偏好喜恶），或改革者在立场、视角、思维方面存在差异，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改革理论与实践。

教育改革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哲学头脑？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何以走向理性和自觉？荣伟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教材，一个案例。这本书对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重大教育实验改革案例进行了评析；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片面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行了批评。所有的基



础教育改革者，不妨用本书所构建的框架图，来解剖一下自己的教育哲学，分析一下自己的言说方式、话语类型、行动逻辑、实践模式、主体形态等，从而更自觉地从从事教育改革与探索。

基础教育改革的力量和智慧来自哪里？我一直认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做法是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主，往往走向了封闭、保守和大一统，丧失了灵活性和创造性。许多改革为什么没有深入持久地进行？为什么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儿小？为什么经常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就是因为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形式主义是对付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也是一线校长、老师用脚投票的意见表达。日本教育家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也分析过教育改革的困难之处。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变革是从课堂开始的，是从教师开始的。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应该学会关注并且推广那些行之有效的民间教育实验，应该汲取民间教育改革的智慧。这也是荣伟这本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是为序。

2012年5月14日晨写于烟台

目 录

前 言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1
第一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当代格局	6
一、原点之思：我们在争论什么	7
二、国际视野：我们在借鉴什么	26
三、本土行动：我们在探索什么	42
第二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言说方式	55
一、谁在言说：话语的主体何在	56
二、向谁言说：对话的他者何在	58
三、如何言说：话语方式的选择	60
第三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类型	66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66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68
三、平民实践话语：经验深度介入教育	69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72
第四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行动逻辑	76
一、谁来改革：教育共同体的扩充与限制	76
二、改革什么：教育目的作为合法性尺度	81
三、怎么改革：科学、政治与精神的融合	86



第五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模式	90
一、行政模式：政策落实作为基本手段	91
二、专家模式：理论创新作为根本目的	92
三、校本模式：行动自觉作为内在动力	93
四、共同体模式：幸福生活作为教育追求	94
第六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体形态	99
一、政策规划型主体：政界的宏观调控	99
二、理论建构型主体：学界的专业引领	102
三、实践突破型主体：一线的自我超越	104
四、商业炒作型主体：市场的利益驱动	106
五、社会公益型主体：民间的教育情怀	109
第七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与目标	112
一、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以素质教育为视角	113
二、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以专业发展为视角	118
三、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以文化建设为视角	121
四、改变父母的家教理念：以家校合作为视角	125
五、改变人才的评价制度：以升学考试为视角	133
六、改变教育的研究范式：以交往关系为视角	141
第八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教学关系范型	150
一、少教多学：批判“多教少学”的有效教学理念	151
二、先学后教：突破“先教后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153
三、以学定教：反驳“以教定学”的教学活动逻辑	156
四、教学合一：针对“教学分离”的教学协同意识	159
五、教学相长：超越“教学互损”的教师职业境界	161
第九章 中国基础教育“九大学派”研究纲要	164
一、“情境教育”三部曲	165
二、“情感教育”的基本框架	168
三、“理解教育”的解释学意蕴	171

四、“生命化教育”的价值定位	174
五、“主体教育”的思辨与实验	178
六、“指导—自主学习”的核心思想	181
七、“新基础教育”研究的理论线索	186
八、“新教育实验”的责任与追求	191
九、我国基础教育“十年课改”的反思	200
 结 语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213
 参考文献	 218
 后 记	 223

一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在当代社会，这是任何个人、家庭、民族、国家都要经常面对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常常不知如何回答为好的问题。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教育哲学、教育基本原理、当代教育理论专题、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研究等学科、课程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从现实来看，这更是一个众说纷纭而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如何实现理想的教育？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与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而且与言说者的个人处境与实际立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印度教育家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年）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慨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自己受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要学习各种科目？为什么参加考试，和同学比得分高低？所谓的教育究竟含有什么意义？它涵盖了什么？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只是为学生质疑这个问题，同时也跟父母、老师以及所有热爱地球的人们，共同来探究这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克里希那穆提还说：“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竞争来受教育？难道受教育只是为了通过几项考试，得到一份工作？还是为我们在年轻时奠定基础，以便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获得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是必要的，然而这就是一切了吗？难道我们受教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他看来，“生命



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更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我们就失去了整个生命的重点。去了解生命本身，比只是准备考试、精通数学、物理或其他科目要重要多了”。他特别强调：“除非教育能帮助你了解广大生命的所有精微面——它惊人的美、它的哀愁及欢乐，否则教育是没有意义的。你也许会得到学位，得到一连串的头衔，得到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呢？如果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你的头脑变得迟钝、衰竭、愚蠢，那么生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所以当你年轻时，你是不是应该弄清楚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克里希那穆提，2004）¹⁻¹⁰

仔细研读克里希那穆提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可以发现，他认为教育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培养人的智慧，让人拥有自由，消除那些外在及内在的破坏人类思想、关系及爱的那份恐惧。在我看来，教育的很多根本问题及其答案是没有时空界限的。克里希那穆提的追问及见解，对于我们认识教育的本质尤其是当前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

相比于家庭和社会，学校无疑是当代教育体系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从制度化教育的现实形态来看，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其实就是在追问：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校？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一书所指出的那样：

教育活动起初是分散的、片断的并为少数杰出人才服务的。这些教育活动，从各个时代和无数历史对比看来，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同一个结论：即建立一种具有普遍使命的、结构坚固而权力集中的学校体系。然而，当这些机构似乎接近完成的时候，出现了或再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校外活动与校外机构，其中大部分往往跟正规的、官方的教育没有任何有机联系。这些正规的、官方的教育十分狭隘，十分死板，以致它们不能包括这些校外活动与校外机构。于是一些开明人士企图用合并学校与校外体系的办法来补救这个不和谐的缺点。但是正当他们在理论上（即使没有在实际上）赢得胜利的时候，又出现了别的意见。新的现实和潜力已经丰富了生活。当前的社会——更不必说未来的社会——的前景已不限于建立一些可以任意扩大和分隔这栋教育大厦，把各种各类的教育加在一起并组合起来的体系。我们必须超越纯

体系的概念之外，来考虑对事物的另一种安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96）¹⁹⁹

不难发现，这段文字为新世纪的教育改革和学校发展提供了一种非常缜密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打破历史传统，突破原有体系，重构教育哲学，重建学校制度。

但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教育和建设什么样的学校？学校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学校究竟应该关心什么、追求什么？目前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有人说“教育应该关怀个体生命”、“呵护生命是学校的神圣职责”，也有人说“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学校是优秀公民的摇篮”，还有人说“教育改变命运”、“不上学读书就没有幸福生活”，如此等等。显然，站在教师、学生、父母、社会等不同立场上，对教育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往往各不相同。而这恰恰是基础教育改革出现诸多分歧的重要原因。

四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学校？这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性和方向性问题。从根本上看，这两个问题之所以人言人殊、莫衷一是甚至彼此对立，与对教育的整体结构和理论基础的认知深度不同有直接关系。其中，对于教育整体结构的认识，关键是要弄清楚“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和“教育该如何”三大问题。对于教育理论基础的认知，关键是要弄清楚影响教育活动的人性论、知识论和学习论问题。

从逻辑上讲，只有把握教育的整体结构，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教育观。而要把握教育的整体结构，首先需要对“教育是什么”——教育的起源及其形态转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即对生物起源论、心理起源论、劳动起源论的差异性，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统一性，形成比较可靠的知识体系。其次需要对“教育为什么”——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进行澄清，即对个体本位论、社会本位论的价值取向，对教育的个体个性化功能和个体社会化功能的整合方式，形成一个站得住的立场。最后需要对“教育该如何”——教育的质量和公平问题进行辨析，即对教育品质的保障制度和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方式，形成比较科学的认知依据。

从实践层面来看，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教育活动必然陷入无知、浅薄



和荒谬。人性论、知识论和学习论是教育的三大基石。首先，教育理论和实践总是离不开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认定，人们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总是以特定的人性思想为基础。实践表明，对于人性的不同见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教育主张，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教育目的与教育功能的不同判断，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原则的不同选择。其次，没有知识传授的教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传授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教育的底线。但是，教育的功能又不仅仅在于简单的知识传授，而在于人的全面生成和发展。正因为人们的知识观不一样，教育思想中才出现了不同的知识命题，教育实践中才出现了形式各异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最后，学习是当代多门学科都在探讨的一个前沿性话题。从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学习这一角度来看，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学习的特殊组织形式。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上看，我们完全可以将学习视为教学的主轴，将教学视为教育的轴心。以学习为视角，很容易看出种种教学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比较容易发现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大误区在哪里。

反观现实，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人们对于教育整体结构的把握并不到位，对于教育理论基础的认知也存在不少偏差和失误。因而，无论是教育基本常识的普及，还是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探究，都任重而道远。

五

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如果没有共同的问题指向，便没有共同的话语体系，更谈不上达成什么共识。一般认为，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两大核心问题。但相比较来看，教育公平主要是一个与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正义（制度）有关的问题，属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外在性、宏观性、背景性问题。只有教育质量才属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在性、本体性、基础性问题。从根本上讲，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才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相对简化了教育公平问题，而将重心落在了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上。

在中国，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根据《教育大辞典》，“基础教育”亦称“国民基础教育”，是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也是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1990）⁷¹。根据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 Basic Learning),“基础教育”即满足人的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该宣言的第一条指出:“每一个人——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基本学习需要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法因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赵中建,1996)¹⁵⁻¹⁶由此看来,基础教育本身不仅是目的,而且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这种基于“个人基本学习需要”的普遍性定义,为我们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的本质特征和改革方向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

最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和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目前尚存在着一定差距。这是探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时必须区别对待的地方。同时,本书所探讨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分析对象主要聚焦在大陆的基础教育改革,因为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原因,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教育改革有其特殊性,通常不在探讨的范围之内。

从19世纪洋务维新时期开始建立新式学堂到20世纪初《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到民国时期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相继出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废旧立新到新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实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基础教育走过了百年历程。因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当代格局可以定位在“废科举、兴学堂”以来的100年格局,也可以定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格局,还可以定位在“拨乱反正”之后的30年格局,再近则可以定位在21世纪之初的10年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当代格局,有其时限、标准、视角、立场的差异性,但更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和演变逻辑。其中,进入20世纪之后的社会制度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尤其是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新世纪格局得以形成的宏观背景。

“史论结合”是探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当代格局的基本方法。但是,人们对于百余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史的基本内容并不陌生,对于眼下中国基础教育“以考为本”的现实状况也比较熟悉,相关研究文献非常丰富,而且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①。因此,本章的重点不在于“史”,而在于“论”,在于

^① 在相关文献中,周洪宇、申国昌的《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一文,划分得比较细致、清晰。该文将百余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史划分成上、下两段。上段为旧中国的教育改革,下段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其中,上段细分为四个阶段:1901—1911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内容包括清末为挽救危亡的命运所进行的学制改革、教育行政机构改革、选士制度改革等;1912—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民国初期及北洋军阀时期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主要有学制改革、教育宗旨改革、机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改革、教学方法改革等;1927—1937年为第三阶段,是抗战前南京国民党政权对教育制度及管理的微调;1937—1949年为第四阶段,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既包括国民政府在战争状态下应对性的教育改革,也包

“以史带论”，寻求将重要基础教育改革事件贯穿起来的思想主题和逻辑主线，进而确立一个分析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框架。同时，在叙述的过程中特别倾向于一种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分析思路，即首先关注当下的、眼前的短时格局、小格局，然后再追溯、过渡到更为深远、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具体而言，本章将主要从“我们在争论什么”、“我们在借鉴什么”、“我们在探索什么”三个方面，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典型性事件进行宏观梳理和评析。

一、原点之思：我们在争论什么

当前，人类似乎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沉重的危机和忧患。除了种族冲突、区域战争、宗教偏见、金融风暴外，瘟疫、海啸、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加上环境污染、人口结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都不得不对一系列挑战。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这样一种时空背景下，教育终身化、社会学习化、发展个性化、人才多元化、知识综合化、生活网络化、管理民主化等已成大势所趋。在这种大趋势下，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间的矛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矛盾、制度化教育与非制度化教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教育必须改革而且很多问题都必须回到原点上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否则，没有出路。

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括革命根据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改革。下段细分为七个阶段：1949—1956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包括新中国教育部的成立、学制改革、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等；1956—1966年为第二阶段，包括1957年高等学校布局调整、1958年教育革命、60年代的教育大调整；1966—1976年为第三阶段，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处于混乱状态；1977—1985年为第四阶段，主要包括拨乱反正、学制改革、教育机构改革、“三个面向”的提出等；1985—1993年为第五阶段，其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学校管理体制、《学位条例》和《义务教育法》出台；1993—2009年为第六阶段，主要有一系列教育法律的制定、素质教育的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教师教育改革、职业教育改革等；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第七阶段，主要标志是国务院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